



俄罗斯汉学文库
БИБЛИОТЕКА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主编：李明滨 孙玉华

俄罗斯汉学的基本 方向及其问题

俄罗斯学者玛雅娃 主编
李志强 张冰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俄罗斯汉学文库

БИБЛИОТЕКА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俄罗斯汉学的基本 方向及其问题

〔俄罗斯〕 Н.Л.玛玛耶娃 主编
李志强 张冰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242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汉学的基本方向及其问题/ (俄罗斯) Н.Л.玛玛耶娃主编 ;
李志强, 张冰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3

(俄罗斯汉学文库)

ISBN 978-7-301-28833-7

I . ①俄… II . ① H … ②李… ③张… III . ①汉学—俄罗斯—文集
IV . ①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9836 号

Издани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о при финансовой поддержк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нда (РГНФ)

проект № 12-33-09006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 Отв.ред. Н.Л. Мамаева: Ин-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4.

© Коллектив авторов, 2014

© ИДВ РАН, 2014

Рецензенты:

докто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Я.М. Бергер,

доктор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В.Г. Буров

Коллектив авторов:

А.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гл. IX), А.Г. Ларин (гл. VIII), А.В. Ломанов (гл. VI), Н.Л. Мамаева (гл. I,
II), А.В. Островский (гл. V), В.Я. Портяков (гл. IV), Д.А. Смирнов (гл. III), М.Л. Титаренко
(введение, гл. VI), С.А. Торопцев (гл. VII), Т.М. Турчак (гл. I)

书 名	俄罗斯汉学的基本方向及其问题
	ELUOSI HANXUE DE JIBEN FANGXIANG JIQI WENTI
著作责任编辑	(俄罗斯) Н.Л.玛玛耶娃 主编
	李志强 张 冰 等译
责任编辑	李 哲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833-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up_russian@163.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350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主编寄语

有一种看法,认为学者关注汉学发展的主题并确定其整体状况,其中包括将中国历史视为汉学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是研究极其深入的标志。的确,总结汉学家撰写的作品并将之系统化,突出和评鉴主要的方向并确定中国研究中形成的趋向,指出“空白点”和有争议的问题,如今已迫在眉睫。

俄罗斯汉学源起久远,它和17—20世纪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团的活动联系在一起。1808—1820年在中国工作的Н. Я. 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 亚金甫)在世界汉学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痕迹。还在1917年前,俄国就确立了研究近邻中国的传统。18—19世纪期间,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职业历史学家研究了汉学的某些方向。^① П. Е. Скачков(П. Е. Скачков)的著作在汉学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② 随后学者们曾多次试图撰写汉学史,但基本上都是按不同的方向和时间段来撰写。尽管1990年代俄罗斯缺乏汉学方面重大的、总结性的著作,但是还是有许多专著、论文集、参考资料、学术杂志上的大量论文、评论出版,也有许多学术活动和国内国际会议的信息发布,这些无疑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二十多年来(1990年代—21世纪初),即我们这本集体著作中所指的俄罗斯汉学研究期间,对汉学总结的程度逐渐在提高,这主要表现在汉学的个别研究方向上。

随着学术团体对国家发展新条件的适应,尽管1990年代汉学家的数量减少了,但是其骨干人物找到了克服障碍的力量,1990年代的作品中,他们在个别主题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一定

^① См.: Гальперин А. Л.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о зарубежн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XVIII—середине XIX в.: краткий обзор//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6. Вып. 2.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的成绩。除此之外,他们也为日后发表于 2000 年代初的研究成果打下学术基础。俄罗斯汉学的主要方向和问题这一研究客体的范围事实上排除了在一本集体专著的框架内,在较短时间内描述汉学发展图景的可能性。至于说到文献的数量,那么汉学研究的每一个方向都可单独成书。但是,多年来首次尝试编写一本总结性的著作本身就值得称道。毫无疑问,专著包含着俄罗斯汉学研究情况的新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将填补这一领域的真空,将俄罗斯汉学研究系统化,并为今后更加详细和全面地研究中国奠定基础。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会让国外研究者了解俄罗斯汉学。在撰写著作时,作者团队运用了问题一年代原则:1990 年代被 2000 年代替换。1991 年苏联的国家体制改变,导致一个相对统一的强国的崩溃,从不同层面影响着科学的状况,其中也包括汉学的研究状况,这不仅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尽管几位有天分的作者出版了几部有分量的作品,但 1990 年代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阻滞了汉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国内的根本变化及其对汉学发展的影响标志着 1990 年代初期是汉学发展的分水岭。

从 2000 年代开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稳步发展,科学发展的基础相应得到巩固,其中包括汉学的发展。2000 年代汉学崛起的要素也同 1990 年代所做工作的成果紧密相关,其中包括文献资料的出版。2000 年代汉学研究出现了全新的机遇,部分机遇 1990 年代就已经出现:国际交流增加;将国外的,特别是中国的文献和史料引入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积极使用新信息和电子技术。在更新史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中国研究新阶段的主要特色之一。研究的主要部分继承了 1990 年代以及更早时期制定的那些研究主题和方向。同时,2000 年代的俄罗斯汉学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主题和科学研究所的形式。

本书分为若干章节,其中每一章都评价和分析了俄罗斯汉学的某个方向。

对每一章而言,首先是在序言中,作者们对 1990 年代以前俄罗斯汉学研究和研究者的关注是一大特色。前辈学人的信息简单扼要,但对于获取几代学者和他们研究成果之间联系的知识已经足够了。比较全面地介绍哲学和宗教领域研究思想发展的第六章是一个例外,这个领域知识的特点及其对从古至今国家历史的极大影响导致了这个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全体作者都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研究人员和本领域经验丰富的专家。

目 录

主编寄语	1
序 言	1
一 俄罗斯汉学:历史联系和世代传承	1
二 中俄文化:认识各民族的智慧	15
三 俄罗斯汉学和当代俄中关系	21
第一章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初俄罗斯中国史研究的特征是 文献丛书和大型文献集的出版	24
一 “17—20 世纪俄中关系”史料丛书 ——两国关系研究的基本史料	25
二 有关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中国政策、中国的革命运动和 内部局势的文献集	51
第二章 俄罗斯的中国史研究:国内政策	59
一 1990 年代的史料出版	60
二 俄罗斯史学	65
三 史料出版与 2000 年代的俄罗斯中国史学界:国内政策	78

第三章 俄罗斯国内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制的研究	116
一 1990 年代	116
二 2000 年代	123
第四章 俄罗斯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方向和特点	135
一 1990 年代	135
二 21 世纪初期(2000 年至今)	149
第五章 最新俄罗斯国内历史研究中中国经济的光与影	169
一 1990 年代俄罗斯史学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172
二 俄罗斯汉学家眼中的 21 世纪中国经济	184
第六章 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	217
一 俄罗斯中国哲学研究学派的形成及发展	218
二 撰就中国哲学百科全书辞典	233
三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	242
四 现当代中国思想研究	255
五 中国宗教研究	261
六 俄罗斯中国哲学研究的总结和前景	269
第七章 俄罗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教育研究	275
一 1990 年代俄罗斯的中国文化及教育研究	276
二 21 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汉学 ——中国文化与教育的现状及发展	289
第八章 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和台湾问题研究	299
一 俄罗斯的中国移民	299
二 俄罗斯的台湾问题研究	316
第九章 俄罗斯汉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化诸问题及其发展模式的研究	327

一 俄罗斯汉学家 1990 年代的研究	327
二 21 世纪初俄罗斯的汉学研究	335
结 语	347
缩略词列表	354
人名对照表	360
译后记	373

序 言

俄罗斯汉学肇始于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团，1711年，传教团由俄国皇帝彼得一世倡议并获中国康熙皇帝批准后成立。300多年间，俄罗斯对中国进行着系统的研究。如今，俄罗斯的汉学界汇聚着1500余名各个研究方向的专家：语言学家、哲学家、语文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宗教学家、文化学家、考古学家、医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人类学家、生态学家、法学家。

300多年间，俄罗斯的学者对客观全面研究中国，在公众中传播邻国的历史知识并介绍其在经济、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发端之日起，对中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高度尊重就成为俄罗斯汉学的特色。与此同时，它也试图在平等协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基础上与中国文化建立多层面跨文明的对话。

一 俄罗斯汉学：历史联系和世代传承

18—19世纪是俄罗斯汉学形成和上升的时期。随着汉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形成，随着研究中国及其文明范围的拓展和深化，汉学的基本研究方向得以确立，其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从历史上看,语言学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第一个方向,其中包括研究当时清帝国主要使用的汉语和满语,以及蒙古语和藏语;编撰词典;在俄语文字中寻找单词、术语和专有名词对等音标。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团的教士和世俗成员是研究汉语的先驱。将研究汉语作为传教团成员科学活动的方向始于 18 世纪的最后 25 年,它同传教团的学生 И. К. 罗索欣(И. К. Рoccoхин 或 И. К. Рассохин)和 А. Л. 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忘我的活动密不可分。后来他们成为俄国皇家科学院的研究员。

第九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团(1807—1821)的领班,修士大司祭 Н. Я. 比丘林是这个科学院第一位选举的通讯院士。他的科学活动为俄国研究以汉语为主的中国诸语,以及历史、民族学、地理、清帝国各民族文化各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В. П. 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王西里)院士、П. И. 卡法洛夫(П. И. Кафаров,修士大司祭巴拉第)、П. С. 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 柏百福)、В. М. 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阿理克)、В. С. 克罗克罗夫(В. С. Колоколов,郭质生)、И. М. 鄂山荫(И. М. Ошанин)、В. М. 宋采夫(В. М. Солнцев)、Н. Н. 科罗特科夫(Н. Н. Коротков)、С. Е. 雅洪托夫(С. Е. Яхонтов)、Б. С. 伊萨延科(Б. С. Исаенъко)、М. К. 鲁缅采夫(М. К. Румянцев,鲁勉斋)、Т. П. 扎多延科(Т. П. Задоенко)、О. И. 扎维亚洛娃(О. И. Завьялова)、Б. Б. 穆德罗夫(Б. Б. Мудров)、А. А. 哈马托娃(А. А. Хаматова)的著作发展了俄罗斯汉语研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

将研究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向事实上始于 18 世纪末。汉语研究的蓬勃发展使早期的汉学家将中国的历史名著俄译成为可能。

俄罗斯外交和同中国的商品交易有赖于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及在北京、伊宁、恰克图工作的汉学家相助。

19 世纪中叶,在伟大的俄罗斯学者 Н. Я. 比丘林、В. П. 瓦西里耶夫、С. М.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和 П. И. 卡法洛夫的努力下,俄罗斯的汉学学派方始形成。其主要特点是综合考量研究客体,特别关注研究原始文献,尊重中国文化并力图在中俄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促进二者相互充实和协同发展。

中国研究始于编撰汉、满、藏语词典,始于了解中国人民的道德基础。

第一本翻译成俄文的中国文献是《三字经》：传统道德规范集成。译者为 А. Л. 列昂季耶夫和 Н. Я. 比丘林。^①

在形成俄罗斯汉学优秀的科学传统过程中，Н. Я. 比丘林起着独特的作用，他是诸多独一无二的中国历史、民族学、经济、哲学、文学著作的作者，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不失其认识意义。据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资料，Н. Я. 比丘林是十几本多少都和汉语相关的词典的编者，这些文献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室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中。^② Н. Я. 比丘林制订的音标最准确地传达了汉语北京方言的音阶，其后 П. И. 卡法洛夫和 П. С. 波波夫将其发展完善。分别筹备出版“汉俄”“俄汉”词典是 П. И. 卡法洛夫和 П. С. 波波夫的不世之功。^③

19世纪俄罗斯汉学的立场同沙皇政府官方立场发生严重分歧并不鲜见。俄国的汉学家们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他们谴责俄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批评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19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历史和 Н. Я. 比丘林事业的杰出继承者们的名字紧密相连：В. П. 瓦西里耶夫、С. М.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К. А. 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孔气）、П. С. 波波夫、П. И. 卡法洛夫。В. П. 瓦西里耶夫院士编订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是这一时期的巨大成就。^④ 这部作品是欧洲和世界汉学史上研究中国世俗和宗教文学最早的学术巨著之一。20世纪初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和孟子（П. С. 波波夫的译本）、韩非子 [А. И. 伊万诺夫（А. И. Иванов，伊凤阁）的译本和著作] 的译著。^⑤ 这一时期汉学家开始研究政治和儒家伦理文化，中国宗教，特别是佛教、喇嘛教、回教和道教。

В. П. 瓦西里耶夫的学生 С. М.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出版了有重大价

^① Сань цзы цзин(Канон трёх иероглифов). СПБ., 1779 (пер. А. Л. Леонтьева); Сань-цызы-цзинъ, или Троесловие. СПБ., 1829 (пер. Иакинфа-Н. Я. Бичурина).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 93, 312, 416.

^③ Кафаров П. И. (Паллади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 2 т. Пекин, 1888; Попов П.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ПБ., 1879; Токио, 1900.

^④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ПБ., 1880.

^⑤ Попов П. С. Кита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Мэн-цызы. СПБ., 1904 (пер. с кит.); Попов П. С. Изречения Конфуция, учеников его и других лиц. СПБ., 1910 (пер. с кит.); Иванов А.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Школа Фа. Хань Фэй-цызы. СПБ., 1912.

值的著作《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和《中国生活原则》。^① C. M.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作品首次论据充足地对“中国是一块历史化石”的论点,对黑格尔关于“全世界精神自我意识的最低阶段”以及康德关于“天朝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的论点提出质疑并从事实上将其推翻。

20世纪初,后来成为院士的B. M. 阿列克谢耶夫论中国文学的作品,以及他的大学公开课资料的出版是俄国在研究中国的事业中意义重大的一件事。事实上,B. M. 阿列克谢耶夫奠定了翻译中国艺术和哲学文本的现代科学方法的基础。他翻译的孔子的《论语》^②和唐朝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成为俄罗斯汉学家、中国文学和哲学翻译家译作的典范。在对中国诗歌三部曲的精深研究中,B. M. 阿列克谢耶夫翻译分析了司空图及其模仿者艺术家黄钺和杨景曾的诗作。^③

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同俄国社会对邻国人民的生活,对他们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英勇斗争,对他们抵抗日本侵略的浓厚兴趣紧密相关。苏联汉学家的功绩在于,他们的著作成为国家制定中国方面政策的信息来源:积极支持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和独立进行斗争的政策。1940年出版,由B. M.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主编的百科全书式文集《中国》就是这种立场的体现,书中罗列了邻国生活所有的基本信息:从考古学历史和哲学到抗日战争进程的特写。^④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抗日战争过程中,苏联和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联系紧密,俄中文化之间充分的跨文明对话得以发展。中方杰出的参与者有作家和政治家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老舍,哲学家杨献珍和侯外庐,伟大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等,俄方有文学家高尔基(A. M. Горький)、B. B. 马雅可夫斯基(B. B. Маяковский)、H. A. 奥斯特洛夫斯基(H. A. Островский)、A. A. 法捷耶夫(A. A. Фадеев)、K. M. 西蒙诺夫(K. M. Симонов),著名的汉学家B. M. 阿列克谢耶夫、C. Л. 齐赫文斯基

^①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ПБ., 1890;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 СПБ., 1888.

^② Лунь Юй. Изречения Конфуция, учеников его и других лиц. СПБ., 1910(пер. с кит. B. M. Алексеева).

^③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837—908); пер. и исслед. (с прил. кит. текстов). Петроград, 1916. 黄钺和杨景曾均为清代艺术家,黄钺著有《二十四画品》,杨景曾著有《二十四书品》。——译者注

^④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 М.-Л., 1940.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齐赫文)、Н. Т. 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Н. И. 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记者 В. Н. 罗果夫(В. Н. Рогов),俄罗斯汉学家和外交家 A. С. 帕纽什金(А. С. Панюшкин)、А. А. 彼得罗夫(А. А. Петров),以及一批杰出的祖国文化活动家。正是中俄文化的这种对话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并成为推动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有利因素。

1923年,Ю. К. 休茨基(Ю. К. Щуцкий)翻译的7—9世纪《中国抒情诗选》俄文版出版。^①随后,这位学者对中国哲学经典著作《易经》进行了翻译和研究。A. A. 什图金(А. А. Штукин)翻译出版了中国诗歌文化最古老的典籍《诗经》。^② В. Н. 罗果夫翻译了一系列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鲁迅《阿Q正传》的译文占有特殊的位置。^③ Н. Т. 费德林翻译并研究中国经典诗人屈原的诗歌。^④后来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的A. A. 彼得罗夫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出版了研究中国道教最负盛名的信徒之一王弼的著作。^⑤一批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专著也随之问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汉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强劲动力。1950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就读于苏联的高校,俄罗斯的学生则在中国学习。于是在国情学家和俄罗斯学家层面形成了对话。应该指出,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国发展复杂而又充满戏剧性的年代里,俄罗斯汉学家研究的主要倾向同以往一样,仍然是详尽全面地研究中国文化史、汉语、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1966年,中国研究的重镇之一——科学院远东所得以重建,全面研究当代中国及其历史、苏中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寻找这种关系发展和正常化之路是研究所研究的重要方向。研究所汇集了最好的专业人才并成为全方位培养年轻的高水平汉学专家的中心。

在研究所的工作中,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问题、克服分歧问题占有重

^① Антолог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рики VII–IX вв. по Р. Хр. /Пер. в стихах Ю. К. Щуцкого, ред., вводные обобщения и предис.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М.-Пг., 1923.

^② Шицзин(Книга песен и гимнов). М., 1957(1-е изд.); 1987(2-е изд.).

^③ Рогов В. Лу Синь. 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ью/ Пер. с кит. и послесл. Вл. Рогова. М., 1960.

^④ Федоренко Н. Т. Цюй Юань: истоки и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1986.

^⑤ Петров А. А. Ван Би(226—249): из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Тр. ИВ АН СССР. Т. 13. М.-Л., 1936.

要地位。在研究所全面的科学规划中,俄中关系史位置突出。研究所一个庞大的规划就是出版自 17 世纪初建立关系起到 1950 年 2 月间俄苏中关系史文献。在 С. Л. 齐赫文斯基院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和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В. С. Мясищиков)的领导下,А. М. 列多夫斯基(А. М. Ледовский)、А. С. 伊帕托娃(А. С. Ипатова)、Р. А. 米罗维茨卡娅(Р. А. Мировицкая)、И. Т. 莫罗斯(И. Т. Мороз)、Г. И. 萨尔吉索娃(Г. И. Саркисова)等一批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13 年时这套独一无二的系列文丛已出版 10 卷(其中 2 卷出了 2 本)。^①

1970 年代出版了一批现代和古代汉语教材、中国史、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方面的书籍。同时还出版了一系列中国通史、1920—1940 年代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国民党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品。С. Л. 齐赫文斯基、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Г. В. 阿斯塔菲耶夫(Г. В. Астафьев)、Г. Б. 爱伦堡(Г. Б. Эренбург)、Л. Н. 西蒙诺夫斯卡娅(Л. Н. Симоновская)、М. Ф. 尤里耶夫、Л. И. 杜曼(Л. И. Думан)、В. И. 格鲁宁(В. И. Глунин)、А. М. 格里高利耶夫(А. М. Григорьев)、Л. П. 杰柳欣(Л. П. Делюсин)、А. В. 梅里克谢托夫(А. В. Меликетов)、Н. Г. 谢宁(Н. Г.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VI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2: 1725—1727/ Отв. ред.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сост.: Н. Ф. Демидова,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А. И. Таракова. М., 199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VI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3: 1727—1729/Отв. ред.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сост.: Н. Ф. Демидова,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А. И. Таракова. М., 200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VI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6: 1752—1765/Отв. ред.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сост.: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Г. И. Саркисова. М., 201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IX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803—1807/Отв. ред.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сост.: М. Б. Давыдова, И. Т. Мороз,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Н. Ю.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М., 199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X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3: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нтябрь 1931—сентябрь 1937/Отв. ред.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сост.: 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Р. А. Мировицкая,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М., 201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X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4;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Кн. 1/Отв. ред.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сост.: 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Р. А. Мировицкая,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М., 200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X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 1, 2/Отв. ред.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сост.: 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Р. А. Мировицкая,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М., 200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 акты. 1689—1916/Под общей ред.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сост.: И. Т. Мороз, В. С. Мясищиков. М. 2006.

Сенин)、Ю. М. 加卢尚茨(Ю. М. Гарушянц)、Г. Д. С苏哈尔丘克(Г. Д. Сухарчук)、Ю. В. 诺夫格罗茨基(Ю. В. Новгородский)、В. А. 克里夫佐夫(В. А. Кривцов)、В. Н. 尼基佛罗夫、Р. В. 维亚特金(Р. В. Вяткин)、Ю. М. 加列诺维奇(Ю. М. Галенович)、А. И. 卡尔图诺娃(А. И. Картунова)、Е. Ф. 科瓦廖夫(Е. Ф. Ковалев), A. C. 穆格鲁津(A. C. Мугрузин)的著作研究了这些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 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教授出版了系列研究俄中经贸史, 以及中国和日本、英国关系史的著作。^① 1974年, 笔名 В. И. 王宁(В. И. Ванин)的经济学博士 В. И. 沙巴林(В. И. Шабалин)出版了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② 著名的汉学家尼科尔斯基(М. М. Никольский)、Э. П. 皮沃瓦洛娃(Э. П. Пивоварова)、А. В. 阿基莫夫(А. В. Акимов)、А. В. 奥斯特洛夫斯基(А. В. Островский)、А. Н. 阿尼西莫夫(А. Н. Анисимов)、В. Я. 波尔加科夫(В. Я. Портяков)、Л. Д. 鲍尼(Л. Д. Бони)、Л. И. 康德拉绍娃(Л. И. Кондрашова)、Е. С. 巴仁诺娃(Е. С. Баженова)、О. Н. 鲍洛赫(О. Н. Борох)、Л. А. 沃尔科娃(Л. А. Волкова)、З. А. 穆罗姆采娃(З. А. Муромцева)是近40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和开放的经验、中国部门经济状况等各个方面的领军人物。

大型学术会议成为苏俄汉学家营造俄中相互理解的氛围的真正舞台, 成为不管国家间关系如何激化, 双方都准备开展实际对话的展示平台。学术会议上, 大家共同讨论中国发展的历史之路, 它同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联系, 并找出两国关系正常化历史必然性的利益共同体。这一立场也是对毛泽东1972年会见尼克松总统时表示中国准备参加美国主导的反苏战线的结构性调整。1980年代末的后续事件表明, 北京听到了俄罗斯社会各界释放的善意信号。这意味着俄中关系新时代的到来。

在经济学博士 Л. П. 杰柳欣的倡议下, 从1970年代开始至今, 苏联科学院东方所经常举办多层次的“中国的社会和国家”学术研讨年会。从

^①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Очерки развития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М., 1953;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 1957; Китай—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деологии. М., 1978;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до 1917 г.). М., 1974.

^② Ванин 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в КНР. М., 1974.

1980年代末开始,远东所就现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和历史问题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1989年,苏联科学院远东所开始举办“中国,中国文明和世界”国际研讨会。2011年,这个研讨会主题为辛亥革命100周年。^①在这次历时多日的研讨会上,代表们聆听到100多场学术报告。2013年10月,科学院举办了旨在探讨中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作用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为期3天。来自10个国家的逾200位学者参加了大会。在7个小组和大会发言中代表们听取了190场学术报告。

1970年,在Г. В. 叶菲莫夫(Г. В. Ефимов)教授的领导下,列宁格勒大学开始每年举办中国历史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严重动荡及苏中关系极其复杂的年代,俄罗斯的汉学家保持了冷静,没有堕入反华的立场。相反,在俄罗斯汉学家的著作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民历史和文化的深深敬意,表现出对我们同中国关系中发生的戏剧性曲折变化迟早都要结束,两国关系必将正常化的期望。许多研究李大钊、彭湃、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的观点和政治活动的著作问世。

转向研究和出版中国人民丰富的文化哲学、历史遗产以及俄中友好史,成为活跃俄罗斯汉学,呼吁研究人员不要仅囿于批判北京当时的反苏政策,而要开始为同中国友好对话搭建一个建设性平台的重要动力。1972—1973年,由В. Г. 布罗夫(В. Г. Буров)和М. Л. 季塔连科(М. Л. Титаренко)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两卷本文集》一书问世,^②稍后又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汉朝》。^③在С. Л. 齐赫文斯基院士主编下,孙逸仙(孙中山)作品的译本和研究著作,^④以及《新时期进步的中国思想家文选》问世。^⑤Л. С. 佩列洛莫夫(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嵩辽拉)翻译并研究了法家的主要典籍《商君书》。^⑥Л. Д. 波兹德涅耶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发表了译

^① Вековой путь Китая к прогрессу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К 100-летию Синх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IX МНК ККЦиМ. М., 19—21 окт. 2011 г.

^②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обрание текстов. В 2 т. Сер. ;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 Сост. Ян Хиншуна, вступ. ст. В. Г. Бурова,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1972.

^③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поха Хань. М., 1990.

^④ Сунь Ятсе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 1985.

^⑤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1840—1898). М., 1961.

^⑥ Книга правителя области Шан/ Пер., вступ. ст. и коммент. Л. С. Переомова. М., 1968.

文集《古代中国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① Л. Е. 波梅兰采娃(Л. Е. Померанцева)翻译并研究了《淮南子》一书。^② Г. А. 特卡琴科(Г. А. Ткаченко)翻译并研究了哲学文集《吕氏春秋》。^③ В. Ф. 古萨罗夫(В. Ф. Гусаров)发表了研究儒家哲学家韩愈(768—824年)观点的系列文章。^④

在杰出的汉学家—语言学家 И. М. 鄂山荫的领导下,始于 В. М. 阿列克谢耶夫的四卷本《华俄词典》得以完成。^⑤ 它的出版是俄国汉学杰出的成就。这部作品曾获国家奖。这一时期苏联的汉学家—文学家 Д. Н. 沃斯克列先斯基(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华克生)、В. Ф. 索罗金(В. Ф. Сорокин)、Н. Т. 费德林、Л. Е. 切尔卡斯基(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М. И. 巴斯曼诺夫(М. И. Басманов)、В. В. 彼得罗夫(В. В. Петров)、Е. А. 谢列布里亚科夫(Е. А. Серебряков)、А. П. 罗加乔夫(А. П. Рогачёв)、Л. З. 艾德林(Л. З. Эйдлин)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的译本,出版了屈原、白居易、李白、李清照、陶渊明的诗歌,蒲松龄的小说,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以及中国童话的译本。中国著名学者袁珂的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的俄文译本出了两版,该书由李福清院士(Б. Л. Рифтин)主编并题跋。^⑥ 书中收集和注释的材料给俄罗斯及欧洲读者开辟了研究中国文化的新层面。

1960年代,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历史学家 P. B. 维亚特金(П. В. Вяткин)开始翻译“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的多卷本《史记》这一名副其实的浩大工程。^⑦ А. Р. 维亚特金(А. Р. Вяткин)完成了这项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出版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和中俄友好关系

^① Позднеева Л. Д. Атеисты, материалисты, диалектик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Ян Чжу, Чжуанцы(VI-IV вв. до н. э.). М. , 1967.

^② Философы из Хуайнани: Хуайнаньцы. М. ,2004.

^③ Ткаченко Г. А. Космос, музыка, ритуал. Миф и эстетика в “Люйши чуньцю”. М. , 1990.

^④ Гусаров В. Ф. Некоторые положения теории пути Хань Юя. М. , 1977.

^⑤ 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В. 4 т. М. , 1983—1984.

^⑥ Юань Цз. Миры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М. , 1965(1-е изд.); 1987(2-е изд.)/Пер. с кит. Е. И. 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 Е. В. Пузицкого и В. Ф. Сорокина, послесл. Б. Л. Рифтина.

^⑦ Сыма Цян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В 9 т. М. , Т. 1. 1972(2001); Т. 2. 1975(2003); Т. 3. 1984; Т. 4. 1986; Т. 5. 1987; Т. 6. 1992; Т. 7. 1996; Т. 8. 2002; Т. 9. 2010.